

西藏春潮

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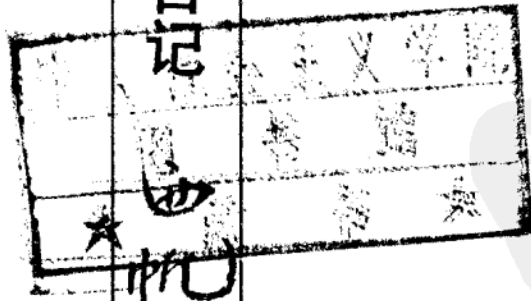
林田著

林田著

西藏春潮

——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

题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27058

西藏春潮 ——

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

林田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 / 32 印张: 7.5 印数: 4000 册

199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 - 80057 - 039 - 8 / E · 23

定价: 精8.50元
平5.50元

丛书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们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

第二辑暂定部分选题八种，即《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川边历史资料选编》、《清代藏事奏牍》、《敦煌文书续集》和《西藏春潮》。其中除《清代藏事奏牍》和《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是这次增补校注重印外，其余六种都是首次成书，而且《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和《西藏春潮》，还是新近成篇的藏事专著。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提供些方便，为后世保存些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自唐代以来的汉文藏事著述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哪一家的收藏是完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早期出版的古

7707/00
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鉴于以上情况，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这些文献。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已行销全国，并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其他外国朋友了解西藏真情，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有助于增进民族团结，那将是一大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业已印行三十多种。

在个别藏学专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自觉地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不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牛力耕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林田的记者生涯和他的西藏日记

—为《西藏春潮》出版而作

陈家璘

林田同志的《西藏春潮》就要付印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这本书是记述西藏山南地区民主改革的一部日记，写于一九五九年夏秋间。书中所记的事已过去三十一年，可贵的是《西藏春潮》对这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斗争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使得我们打开书本，眼前就可以重现这段开辟了西藏人民新时代的历史。

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要留给读者去作。但我作为第一读者，如果可以预先谈点什么的话，那么我要说的，也是我最突出的感想，就是四个字：文如其人。

我与林田相识四十多年，过从颇多。我们年轻时作为新华社记者一起在西藏期间，同甘共苦，多次合作，“冰原并辔抒心志，雪地同毡话乾坤”（林赠我诗中语），可说是老朋友了。这次我又为《西藏春潮》的出版当了编辑，所以很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他的记者生涯和他的西藏日记的情况，也许对读者有些用处。

林田是河北乐亭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担任过多年的分社领导工作。

他的记者生涯中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

他当了四十年记者，大约有三十六七年在边远地区采访。按他自己的说法，叫“靠边转”。他一九四八年到新华社，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的报道工作。一九五〇年夏天，他刚刚从川、贵剿匪前线回到重庆，就马上又打起背包，奉命前往加入了进军西藏的行列，这一去就在西藏干了六个年头。嗣后，回北京不久，又自己要求到了内蒙古，后来又从那里被调到甘肃。这些地方可不是人人都爱去的。当年，不是流行过“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都爱去，就是不去新(疆)西(藏)兰(州)”这样一句话吗？林田不曾去新疆，“新西兰”少去一处，可是他去了“蒙西兰”，还是“靠边转”。这么一转，从青春年少转到了满头花发。但他转得自觉，转得高兴，而且转到哪个地方，就爱上哪个地方。每逢谈起那里的人物山川，总是兴致勃勃，一往情深，说话间起立踱步，指指点点，嗓门越来越高，两只眼睛也明亮起来，那神气好像是说凡他去过的地方，都是世界上最好最重要的地方。

“靠边转”毕竟是艰苦的，尤其是在西藏开头那几年。爬雪山、走草地，铺冰卧雪，以马料野菜为口粮，一连几个月忍饥挨饿；有时候发霉的糌粑把人们的肚子胀得圆圆的，其苦，

甚于挨饿。这些都是进军西藏期间不只一次遇到的事。到达拉萨以后，因住房极其紧张，我们曾一起打地铺睡在厕所门外的过道里，地冷风寒，通夜暖不热身子，往往半夜冻得爬起来点上蜡头抽旱烟。长期的难苦生活，给林田留下了胃溃疡。他不当回事，又老是忙于工作，没有及时治疗，以致病情越来越重，很受折磨。记得一九五三年元月，我们从日喀则回拉萨，途中他胃病犯了，疼得下了马就地打滚，抱腹呻吟，脸色如地皮。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又没药，真是急死人。但过一会儿他病痛稍有缓解，就催我一起上马登程。当晚在业当村住宿后，他照常用初学的藏语同房东聊天，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口问手写，谈笑风生，好象从未生过病一样。一九五四年冬，康藏公路即将修到拉萨，我们筑路报道组工作很紧张，他胃病屡发，要我向工地医生“求情”，给了他二十几片含鸦片的止痛药，他与医生达成“协议”，每天不超过两片，他就靠这个药片坚持完成报道工作。

有几年，林田靠吃乌贼骨粉止胃疼，自名之日：“开小灶”，无论到哪儿去，身边总带一小袋专用的“小锅饭”，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吃下的骨粉越来越多，而溃疡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频，“小锅饭”不灵了，他这才下狠心放下工作，把胃切除了一大半儿。手术后，同志们看他身体垮了，劝他快回北京，再不要靠边转了。有一阵子，有关领导也曾表示关心，同意调他到北京或天津工作，但终因他不愿为个人的事去“活动”，而未调成。他不顾手术后经常出现低血糖引起的心

慌手抖，又带上他的“小锅饭”口袋回大西北靠边转去了。不过这时的“小锅饭”不是骨粉，而是几块应急的饼干，是对付低血糖的。同志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谁知他三转两转，身体倒慢慢好起来了，早已甩掉了“小锅饭”口袋，这也叫善有善报吧。现今他索性在甘肃扎了根，心安理得地做了“老甘”。

其二，他爱往下面跑。

林田随军进藏和驻藏六年，在机关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不是部队基层、建筑工地，就是在农村牧区。六年间，他在拉萨市和现今的六个专区都留下了脚印。

他不怕吃苦，哪里艰苦，哪里有群众的创造事业，他就跑到哪里去，生活在群众中间，同群众交朋友，通过访问、观察和体验，占有大量的材料，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写出文章来。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进藏部队的连队里，同战士们一起跋涉于难险的高原征途。部队上雪山修公路，他也随部队上雪山，住在战士的帐篷里，同战士一样吃野菜糌粑糊糊，还半天采访，半天到班里和战士一起开山筑路。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他两次访问后藏的农村牧区，多次住进农奴的小土屋和牧民的牛毛帐篷里，了解农奴和牧民的病苦与要求，同他们一起围着牛粪火谈至深夜，然后席地而眠。一九五四年，他在康藏公路工地采访，常常攀高涉险，风里来，雨里去，艰辛异常。一九五五年，他重返昌都地区，奔波于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一九五六

年；他随中共西藏工委派出的黑(河)阿(里)公路探路队，穿过人迹罕见的“羌塘”(藏北高原)到阿里，同勘探人员一起度过了一个半月的探险生活。抵阿里后，又骑马骑骆驼访问了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寒牧区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农村。这次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采访，前后历时七个多月，他和同行的《西藏日报》的倪潜同志，是最早访问羌塘和阿里的记者。一九五九年，他正在内蒙古工作，西藏发生反动农奴主叛乱，他第二次被总社派往西藏，他到拉萨不久，就主动要求去山南地区农村，因为那里平息叛乱后，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火热斗争已经开始。在山南，他选择了中共山南分工委进行民主改革试点的凯松谿卡(谿卡即庄园)作为采访调查的据点。这个庄园是西藏大农奴主、首席“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执政官)、叛匪首领索康·旺清格勒家最早的庄园之一，它在完整保留与体现农奴制庄园经济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林田在这个庄园一蹲就是三个半月，除了有时到上面跑一跑以外，大部分时间与工作组同志和农会委员(翻身农奴代表)同吃同住，对农奴制度和民主改革的全过程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以后他在内蒙古和甘肃工作，仍然保持着喜欢下基层，到群众中去的作风。正是这种眼睛向下深入群众的采访作风，使他能了解到有些记者不注意或不屑于了解的有关群众思想和生活的真实材料，使他的新闻报道不仅能比较准确、生动地表现群众的斗争与生活，而且能比较早地反映出

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不少新闻作品中，流露出他与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诚挚感情，我认为这些正是一个记者最可贵的品质。

其三、他坚持记采访日记。

林田在西藏期间，除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外，还长期坚持写日记，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习惯和爱好。他的日记与一般人的日记不同，常常只要下去采访就一天也不间断地记，回机关整理材料，写稿子时就停下。他常说：我的日记是采访日记，是记下作为记者应当记录而当场在采访本上来不及记的东西。因此其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采访对象的谈话内容，神态，事件与场面的情景，而且还有他个人的感受以及对环境、风光的描绘等等。

他最早的日记是作为随军记者在进军大西南的行程中记下来的（这本日记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名《大军西南行》）。那以后，好象他已意识到一个记者记录历史的责任，从进藏开始，就更详细地记起日记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身体多么劳累，总有记述，很少间断。

他在西藏期间的日记，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分类，可以列为四个专题：进军西藏日记、筑路日记、羌塘阿里日记和民主改革日记。其中进军日记在五十年代初发表过一小部分，很受读者欢迎，有两篇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全部进军日记十几万字，有待整理出版。筑路日记五万多字，已收入《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中，是该集的重要篇章。

民主改革日记就是《西藏春潮》的主体部分，也有数万字。在这三部日记里，林田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现场收集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详细记述了关系到西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三件大事，从若干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头十年的历史。羌塘阿里日记也有其独特价值，因为是新中国记者关于这块鲜为人知的地域的最早的记述，现在林田正在整理。有人建议林田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几种日记汇集在一起，出一部《西藏日记》，我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如能实现，当是一件功德之事。

林田是个老实人，他写的文章也是老老实实的文章。无论记事写人，务求准确真实，不雕凿，不粉饰，宁以平易之词写出真情实谛见长，而不以故作巧言或卖弄噱头取胜。或有感慨议论，也必言出肺腑。因此一般来说，他的文章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得到读者的信任。他的这种求真务实的文风，在日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由于写日记不受某些格式或框框的限制，写什么，不写什么，这样写，还是那样写，或长或短，或详或略，都取决于自己，所以他写起日记来，好象思想更开阔了，手脚更灵活了，文笔也更流畅了。比起他的有些文章来，他的日记写得更真切，更活泼，也更吸引人。读他的日记，就象听他用乐亭乡音讲故事，朴实而动人。他所写的关于西藏几件大事的日记，都翔实而具体；他笔下的人物，淳朴而生动；他爱憎分明，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战士的热爱，对农奴和奴隶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封建农奴制

度的憎恶。他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意，感人至深。当年参加过进军和筑路的老同志，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重温那个年代的战斗生活，得到安慰和力量；当年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西藏老辈，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重读自己的翻身史，会更加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坚定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信心；出生在新社会的西藏新一代，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懂得什么叫封建农奴制度，什么叫新社会，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研究藏学的专家学者，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找到难得的珍贵史料，会使研究工作更好地联系群众和实际；对西藏存有某些疑问的外国朋友，仔细读一读林田的日记，如果不抱偏见，就会对西藏的事情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它们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西藏人民的；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的革命，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西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百万农奴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农奴制度的锁链，取得做人的权利，的最伟大的人权运动，也是真正的最广泛的人道主义的胜利。近十年来，我因整理西藏汉文历史文献，留心阅读过的清代以来入藏人员的日记著作不下十余种。这些日记各有独到之处，都有流传的价值。但由于作者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和其他原因，这些日记中又都有不足和可议之处。就日记涉及的事件、思想内容、记事的准确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来说，林田的西藏日记，都是前人的日记不能与之相比的。可以想象，再过若干年，

人们也许会发现林田日记的更重要的价值。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林田写下这些日记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毅力，需要难辛的劳动，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精神。

进军西藏开始时，康定以西还没有公路。跨越整个横断山脉的数千里的草原古道上，重重雪山，条条冰河，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在这样的环境里，空手走路犹感艰难，而战士们却要每人身背七八十斤的口粮、装备行进。每当爬山临近山顶，空气更加稀薄，人们呼吸更加困难，只能一点一点向上挪动。高原冰河多为雪水，冬季渡河，两腿入水便觉砭骨刺心，待挣扎上岸，腿脚早已麻木，石子冻结在脚底上。林田作为年轻记者，不仅自己也负重四五十斤和战士一起每天跋涉十个小时以上，而且常常帮病号扛枪背米袋，到宿营地和大家一起架帐篷、拾烧柴，直到人们吃过饭并入睡以后，他才带着一天的劳累，在帐篷一角就着摇曳的烛光，开始记下一天的见闻。

林田的筑路日记大部分写于康藏公路的波密地区。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不稳，常有山崩石滚，流沙塌泻。夏秋多雨，山洪和泥石流不时奔腾呼啸而下。筑路大军在这里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艰险工程，为修通这段一百八十公里的公路，五万多名战士、工人苦战了一百八十多个日夜，成千名的同志献出了生命。在这战场一般的工地上，林田常常携带一件雨衣，背一挎包，不分昼夜地攀崖爬

坡，观察访问。他不顾险工地段随时有伤亡危险，走遍了每个工区。在他写日记的工地帐篷里，白天闷热似蒸笼，夜晚大个蚊子和各种毒虫蜂拥而来。林田为记日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挨了多少蚊子叮咬。至于在类似探险生活的条件下记下藏北高原日记，在与农奴同吃同住中记下民主改革日记，其所付辛劳与忍受的困苦亦可想而知。可以说，林田的西藏日记，四个部分共数十万言，字字皆辛苦写成。

林田曾风趣地自嘲说：我“命”苦，是个“三苦记者”；一是多在难苦地区工作；二是多采访报道劳苦群众；三是自知愚拙，靠刻苦精神效命人民。他还讲过。他的记者生涯中吃苦不少，工作是勤恳的，但成绩并不大。从他自己说，这些都是真心话，由此更可看出他严以待己、责己的情操。不过，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成为声噪一时的名记者，但他的实际成绩和对人民的贡献却不算小。许多人都记得，无论是在进军大西南，进军西藏的历史壮举中，还是在包钢和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中，以及最后在甘肃的农村经济改革中，林田都留下了若干深受读者欢迎的新闻作品。而这只是他的成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也许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则是他的日记，特别是西藏日记。它的出版，可以算是对我们“三苦记者”的一种报偿，因为吃苦者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奉献于别人面前，就是最大的“苦中有乐”。

一九九〇年七月

于北京

自序

这里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三十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西藏山南地区采访民主改革的几个月的日记，以及同一时期写的调查报告和报道。这些调查和报道，有几篇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而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未发表，现在也如日记一样是第一次刊印出来。

有的同志曾建议我把日记改写成系列文章，但我自己更珍惜的，却是它的原始记录的性质。我希望有机会打开这本书的人，也能把它作为原始资料来阅读、研究。因为这本小书的价值就在于用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不加任何雕琢地描绘、分析了西藏农奴制度，记录了废除这种制度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不足之处是缺乏全貌性的资料和宏观背景情况。但我不揣冒昧地说，对于关心西藏人民命运和有兴趣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来说，抽象的、概括性的材料容易找到，而这样直接、具体、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材料却不是随处可以得到的。正因为考虑到这点，所以我在抄写、整理这些日记和文稿时，除改动了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以及在少数几处读者难懂的地方加了一些说明性的语句以外，其余一律保持原样。

历史已经证明，每个民族在其发展中都有它的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进步的时代，有它的阳光灿烂的生机勃勃的日子。一九五九年初夏开始的这段时间，正是世代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的这样的时刻和日子。在此以前，西藏一直保留着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农奴制。这种社会制度，如果不是当代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制度，至少也是这种制度中的一种。为了说明西藏社会上层同意改变这种极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中国共产党和包括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整整等待了八年，最后一小撮反动的大农奴主还是发动了武装叛乱。不管他们在叛乱中打着什么旗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永远维护这种腐朽的制度。不过事态发展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叛乱及其被迅速平息，大大加快了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而经过这场短短几个月的和平的革命——民主改革，就使百万农奴结束了千年悲惨、屈辱的岁月，开始了有作人权利的新生活；使这个久被遗忘、压抑的古老的民族一下子年轻起来。歌声笑语代替了痛苦的呻吟，自由劳动代替了皮鞭下的苦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替了精神上的麻木和叹息。劳动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精神振奋，情绪昂扬。高原上处处涌动着一股春天的气息。不管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什么曲折，这次民主改革对于西藏民族都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一次伟大的转折。

我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随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